

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

——基于现代化历史的全景式考察

燕继荣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基于全景式考察的方法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革命性变革，其核心在于以科学知识驱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以“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有为型政府—适应性治理”为核心的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兼顾发展与治理、平衡政府与市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非西方范式，为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了新的实践智慧与制度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理论；国家治理；知识贡献

作者：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方法论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②这次会议着重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自主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2025JZDZ017）、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25@ZH002）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

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①

现代化带来了知识革命，开启了在增长规模和变化速率意义上的“知识爆炸”。现代知识不仅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变革，也塑造了现代社会，为现代人的文明生活提供了价值标准。当今，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对现代化的理解，形成了适应自身资源禀赋和历史情境的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及政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现代化发展形态与实践范式的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升华。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相比有什么特点？如果说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为现代知识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要素，中国式现代化又在现代知识的基础上丰富了哪方面的内容？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基于全景式考察的方法论，解答现代化的中国版本新意何在，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

全景式考察的方法论旨在超越线性叙事和单一中心论，从而构建更复杂、更真实的世界现代化图景，主要包含了如下三方面的要点。

第一，宏阔视野下的比较与联系，即摒弃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狭隘视角，将西方现代化过程和路径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下，与非西方地区的文明性质和现代化尝试进行系统比较，力求在跨文明、跨区域比较中形成结论。此外，基于全球互动的事实，对现代化的全景式考察在方法论上强调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跨国联系，考察殖民扩张、贸易网络、技术转移、思想传播、移民流动等因素如何深刻塑造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将工业化的兴起置于全球网络中进行理解，揭示不同地区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二，多维要素的整合性分析，即超越经济决定论，不仅把现代化过程视为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还将其视为涵盖政治制度变革、社会结构转型、文化思想嬗变，以及环境变迁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变。同时，对现代化的全景式考察注重分析这些维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形成多维交织的研究。

第三，长时段与非线性视角相结合。拉长时间尺度，将现代化进程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在全球化过程中追溯前现代根源，关注长期趋势与深层结构。另外，坚持非线性发展认知，摒弃单一、线性的进步史观，承认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曲折性、异步性和矛盾性。

综上，宏阔视野、多维分析与长时段审视，构成了全景式考察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分析原则。而要将这一研究思路落到实处，确保考察过程的严谨性与解释力，还需要遵循以下三点规范性研究准则。

第一，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与对话。对现代化历史的全景式考察需要具备历史学知识，同时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实现真正的知识融合。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4—5页。

第二，多元史料的发掘与互证。运用不同来源、性质的史料进行交叉验证与互证，力求接近更全面、更客观的历史图景。

第三，理论自觉与反思批判。对源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模型保持高度警惕和批判性反思，避免简单套用。在比较与反思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索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的独特逻辑与内在动力，寻求更符合历史语境的本土化解释框架，关注现代化与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结合。

总之，现代化历史的全景式考察包含了全球眼光、多维视角、长时段思维三方面要点，以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对话、多元史料的发掘与互证、理论自觉与批判反思为准则，旨在揭示现代化这一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多样路径、复杂动力、内在矛盾和深远影响，最终实现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更为系统深刻的理解。

二 现代化的实践与认知

对现代化历史的全景式考察要求长时段的观察视野。回顾人类进化的历史，人类的生存方式经历了从采集狩猎到农业定居或迁徙游牧的跃迁，后又卷入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的浪潮，如今正步入一个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时代。其中，以工业制造为标志的现代化，把漫长的人类社会分成两个时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逐渐推开的全球化进程。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叶于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到来前的漫长时段，人类缓慢演进，在依靠人力、畜力与自然环境的传统社会，生产力维持在较低水平，人类生活经常陷入战乱、灾荒、瘟疫等灾难之中。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停滞或极低水平。人类经历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并且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主要开始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人类历史的演进表明，农业时代的财富增长与工业时代的财富生产，在逻辑和效能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量级差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物质财富的积累主要依托土地的自然产出，本质上是一种受制于生物节律与生态约束的有机增长。其核心逻辑植根于光合作用、水文循环与土壤肥力等自然过程的转换效率，财富增量始终受限于可利用的土地面积与单位面积的生物质能产出。在这种模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精耕细作、作物轮种、水利改良等渐进式手段，即便偶有农业剩余，也往往被同期的人口增长所稀释，使社会总产出长期在生存线上下波动，难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持续跃升。与之形成根本性分野的，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另一种逻辑：通过系统性地消耗存量巨大的化石能源，借助科学知识与技术装备在工厂体系中主动制造产品，从而打破了自然的硬约束。从工业革命开始，社会呈现加速变化的特征，生产力水平加速提升，社会产品供应速度也随之大幅加快。现代化兴起了制造业，人们凭借科学、技术知识，制造产品满足需

求，由此开启了一个财富创造的新时代。随着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跃升，物质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科学知识赋能工业体系，生产能力极大提高，社会得以满足基本需求，从此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进入消费时代。

在社会生产主要依赖经验传承与自然禀赋的时代，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物质资料供给能力总体有限，社会经济长期呈现物资匮乏、供给不足的基本特征。进入现代工业制造业时代，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人类依托科学理论突破与现代技术体系，通过系统性开发自然资源、集约化组织生产，实现了物质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与批量化供给。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推动社会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由此形成产能扩张与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特征。所以，相对于以往的文明，工业文明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和革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并深度融入经济社会体系，人类社会正迈向智能文明新阶段。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制造与现代服务领域的普及应用，智能生产系统依托全天候运行、无耗损作业和持续迭代学习的技术优势，将推动社会生产能力与服务供给效能实现革命性跃升。毫无疑问，那将是人类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和革命。

明确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不同，就不难理解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全球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呈现巨大差别的根源。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在农业文明下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重塑中未能延续其领先地位。

对于现代化的认知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如何认知“现代化”影响了发展的路径选择。对现代化的溯源研究，首先从考察认知变化开始。“现代—传统”“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对现代化的溯源研究发现，“现代”（modern）一词源于公元4世纪，被用来说明当时已经基督教化了的“现今时代”，以区别于古罗马前基督教时代的“往古”（ancient）。所以，它最早只是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一个概念。^①

在当前的理解中，“现代”一词被赋予两种含义。^②第一种是泛指含义，被用来当作“目前”“现在”的代名词，泛指人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的时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概念具有时间不确定的相对意义。根据这个含义，人类任何一个“过去”的时段都曾经是“现代”，而如今“现代”也将成为将来的“过去”。所以，泛指意义上的“现代”概念是一个不具有特定指向的时

① Krishan Kumar,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67.

②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间概念，它更体现“当下”的意思。“现代”一词的第二种含义是特指含义，主要指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发展时期。这也正是发展理论家们在研究中所理解的“现代”概念。根据这个含义，“现代社会”是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的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它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权威的理性化和文化的世俗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判断经历了多次认知转型。创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依据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假设，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社会向工业民主社会演进的必然过程，依据西方现代化经验，强调经济指标与制度模仿的重要性，得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结论。而后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反思。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运用“中心—边缘”的分析架构，揭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存在剥削结构关系，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受制于国际资本的客观现实。以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为代表提出的世界体系论，将现代化置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中，强调核心区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夺边缘区，从而打破了现代化指向“进步”的神话，把研究的关注点引向贫富分化、文化断裂等依附性发展的代价。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进程，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从欧美开始，逐渐向全球扩展，并带来社会全面变化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的深化，现代化被理解为多元文明对技术理性的差异化回应，在此视角下，儒家伦理、印度教哲学等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受到重视；在现代性反思中，生态危机、人性异化等工业文明痼疾受到批判。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态势明显弱化，东亚经济奇迹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样本，生态危机则迫使人们反思工业文明的代价。

如果说早期的现代化研究把现代化进程理解为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变化进程，因而经常被认为持有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优越论的立场而遭受质疑和批判，那么，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则由于极大地修正了传统观点而使现代化研究得以复兴。正如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指出的，现代化理论需要修正，这是由于如下原因：第一，现代化不是线性的，它不一定朝一个方向运动；第二，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传统的社会文化遗产会经久不衰；第三，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工业化过程始于西方，但西方工业化并非唯一标准版本；第四，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从长远看，它只带来了使民主日益成为可能的社会文化变迁，现代化所引发的知识社会的出现提高了民主兴起的可能性。^①

①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民主》，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 21 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 133—134 页。

综上所述，认知中的现代化从单纯的时间性概念发展至全面性的社会变革，经历了“现代化=西方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现代化是线性进化、经济指标代表现代性等不同阶段。现在，学界更强调现代性的复数形式（modernities）、路径多样性、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如今，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调和科技理性与本土文化认同、突破物质现代性、构建包含精神价值的新型人类文明等成为现代化研究的未竟议题。

中国在对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求索过程中，对现代化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革。具体而言，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实现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物质追赶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跃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的目标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 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的目标维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更进一步彰显了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传统与广阔的市场规模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正在创造一条植根于自身国情、超越资本逻辑、追求公平正义的独特路径。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衡量尺度从侧重单纯的经济数据、城市景观等硬实力，深化至包含治理效能、文化自信、生态福祉、公平正义等软实力在内的综合指标。这些认知跃升标志着中国从现代化的学习者逐渐成为主动贡献者，展现出中国对现代化发展规律所贡献的智慧。

①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8、20页。

三 现代化的多重版本

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大工业的浪潮席卷四方，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其结果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起步有早有晚、节奏快慢不一，受历史积淀、文明传统、制度模式、地缘环境及工业革命扩散规律等多重因素深刻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时序落差与类型分化。欧美国家依托工业革命先发优势，最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率先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结构现代重构，形成原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多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受殖民历史、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等制约，现代化起步时间大幅滞后。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后发国家的人们期望现代化、大力建设现代化，但时常陷入现代性的重重困境。由于信奉自发秩序和自由放任理念，国家协调和调控缺位，因此早期现代化留下许多后遗症，许多国家陷入了现代性危机，自此“治理”成为探索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纵观全球现代化理论谱系（见下页表），各主流流派虽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发展与治理的某些侧面，却均面临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经典现代化理论秉持线性进化论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将西方工业社会形态奉为终极模板，这不仅抹杀了文明多样性，更使后发国家陷入“路径依赖”的迷思，难以找到适合自身文化土壤的转型路径。依附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心—边缘”之间的剥削性积累与不平等交换，主张通过脱钩自主发展挣脱西方资本控制。然而，其困境在于过度强调外部结构制约，在实践中易导致封闭锁国，进而造成技术迭代滞后与内生动力匮乏，难以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世界体系论通过“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三级结构，动态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强调通过产业链位置跃升改变国际分工地位。但世界体系论的困境在于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固化了等级秩序，相对忽视了文明主体性与国家内部制度创新的能动作用，对边缘国家如何具体实现跃升缺乏可操作的路径指引。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万能论”与“最小化政府”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双刃剑。私有化与自由化虽然短期激活了市场，却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并因缺乏有效监管引发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东亚模式凭借开发型威权与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但其政商联合体结构易导致财阀垄断与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且在经济起飞后普遍面临民主化转型的震荡。

上述理论或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或受制于结构性决定论，或陷入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均未能为后发国家提供一条兼顾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完整方案。

表 全球现代化理论谱系对照

理论流派	理论代表	核心逻辑	发展引擎	发展目标	实践困境
经典现代化理论	罗斯托等人	线性进化论 传统—现代二元对立	工业化＋城市化	西方工业社会形态	文明多样性湮灭 后发国路径依赖
依附理论	弗兰克等人	中心—边缘结构 剥削性积累	脱钩自主发展	挣脱西方资本控制	封闭导致技术滞后 忽视内生动力
世界体系论	沃勒斯坦等人	三级结构（核心—半边缘—边缘）	产业链位置跃升	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固化等级秩序 忽视文明主体性
新自由主义	哈耶克等人	市场万能论 最小化政府	私有化＋自由化	全球市场一体化	加剧贫富分化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	约翰逊等人	开发型威权 出口导向	产业政策＋教育投资	国民收入倍增	财阀垄断 民主化转型震荡

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目前，中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立足高质量发展目标，推动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内涵提升。从现代化主导力量的角度看，相较于其他国家所采取的社会促进、政府主导、计划管制、外资拉动等方式，中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政党驱动”的综合现代化模式参考。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既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又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它凭借强有力的领导、持续不变的行动意志、有效的组织、灵活适应的政策实践等制度供给，成为解释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的政治原因。

“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有为型政府”共同构成中国宏观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结构的整体效应和政策实践有助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和国家发展意愿的落地生根。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在政策领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体现出中国政治制度的韧性和治理适应性，形成“适应性治理”格局，这正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需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效果。^①

（一）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的塑造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以其人民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

① 燕继荣、李修科：《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10 期。

党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意识，使其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代化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

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如何保持执政党持久的领导力是问题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始终把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其奋斗目标，努力完善施政理念，提升执政能力，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民主监督与政党自我革命是中国在政党建设方面为后现代化国家提供的重要经验。

（二）自主性国家

“自主性国家”是后现代化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生产方式市场竞争的体制下，保持了国家自主性，从而对外保证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对内避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有效实现国家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国为后现代化国家提供的经验是，对外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对内要在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有活力的社会，让人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在日常生活中充分行使民主权利。

（三）有为型政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国政府积极发挥“有为型政府”的功能，支持建设一个有效市场，既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保证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和转轨国家，这只“扶持之手”一方面要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下孵化一个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以政府的力量加速资本积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促进技术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国家均衡发展战略。

现代化发展要求国家治理保持统一、均衡、均等、可持续的环境和状态，需要“有为型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为后现代化国家提供的政府建设经验在于，打造“有为型政府”，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求合适的边界，保证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也不越位；同时，要求政府恪守法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证依法施政，维护公民、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各方合作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适应性治理

“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和“有为型政府”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宏

观结构。适应性治理植根于中国政治结构，得益于政党、国家、政府在动态运行及政策执行中的有机协同。适应性治理不仅是对中国制度韧性与适应能力的理论解释，也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制度原则。从政策过程来看，中国的适应性治理经验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第一，在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坚持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确保中国的公共政策体系既体现出灵活性，又表现出稳定性；第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坚持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公共决策体制，支持集思广益式的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第三，在公共政策创新过程中，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使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与地方先行先试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良性互动。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推进过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更需保持制度韧性和执行力的“适应性治理”。党和政府应该继续以现代化为目标和动力，保持开放、学习、改革、创新的态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现代化方案，中国的发展与治理现代化也将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国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的经验是建立开放、包容、及时纠错的决策体系，永葆开放、学习、改革、创新的态度。

对现代化历史的全景式考察显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其发展成就更适合在中长期的观察中作出评估。现代化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初，现代化以工业化、自动化、全球贸易、国际分工与协作等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如今，现代化正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必然趋势，塑造未来世界。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并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以“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有为型政府—适应性治理”为核心的宝贵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兼顾发展与治理、平衡政府与市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非西方范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为推进全球现代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责任编辑：郭云蔚〕